

编者按 本文是 2006 年 5 月 25 日在香港大学召开的“中非人力资源开发与合作”学术研讨会的系列论文之一。作者基于贫困的持续性与其各构成要素的相互关联性这一机理，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测度和评析尼日利亚与中国的减贫政策及其实施效应，反映了国际学术界对减贫问题的研究动态。诚然，本文仅代表作者的观点。

千年发展目标与减贫政策 在中国和尼日利亚的作用

拉瓦尔 M. 玛拉法*

引言

对生活质量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¹ 当前对生活质量的研究涉及一系列不同的学科领域。不同学科对生活质量的定义和分析也不一样，对生活质量的定义也与当地文化背景和教育水平有关。因此，为了研究、理解和量化生活质量，现有对生活质量的研究使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主观方法和客观方法。^④ 虽然生活质量方面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探讨发展问题，但是研究人员尚未就生活质量的准确定义达成共识。一般说来，一个国家的生活质量是指本国国民的生活状况。最近，研究人员开始用减缓贫困的程度来表示生活质量。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一些国家的政府制定了消除贫困和提高特定人口生活质量的政策。

作为体现经济福利（或生活质量）指标之一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直被用来衡量福利状况。但是在普遍应用这一指标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重要问题。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本身的性质、本币转换的问题及收入和福祉在哲学上的区别，^④ 都会因不同文化对生活质量的定义存在地

区差异而有所不同。^¼ 尽管在国家间很难比较生活质量，但是在承认文化差异的前提下，这些可以被量化、分析和讨论的通用指标仍可被用于评价特定地区的生活质量。在当前的发展问题研究中，国际社会用减缓和消除贫困的程度，以及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进展作为更高生活质量的标志。在新千年前夕提出千年发展目标的过程中，非洲国家发展问题成为当时的主要议程之一，且成为之后讨论的焦点。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之一，在减贫和提高国民生活质量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同时也预计在 2015 年之前实现千年

* 本文作者拉瓦尔 M·玛拉法（Lawal M. Marafa），系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系教师。

¹ See S. McCall, “Quality of Lif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75 Vol 2, pp. 229–248.

^④ See D. Hayati E. Karami and B. Slee, “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the measurement of rural poverty the case of Ira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6, Vol 75 pp. 361–394.

^④ See D. J. Slottje, “Measuring the quality of life across countri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1, Vol 73 pp 684–693.

^¼ See G. Hostede, *Culture’s Consequences*, London: Sage 1980.

发展目标,¹ 非洲国家能从中国人力资源发展过程中学到那些东西呢? 虽然对于许多人来说, 非洲国家似无差别, 但是不能在这样的假设下讨论千年发展目标和生活质量。而事实却是: 从人口规模看, 非洲国家间有差异; 从国内生产总值看, 非洲国家也互不相同; 非洲国家在教育和文化水平方面也有不同点。因此, 本文通过着重分析中国和尼日利亚的事例, 以建立一个能够深入理解减贫和提高生活质量政策的比较框架。

由于对生活质量的研究所采用主客观两种方法, 本文将在中国和尼日利亚的比较框架下同时采用这两种方法。客观方法使用了一系列与生活质量有关且有明确含义的指标; 而主观方法则把生活质量等同于个体所获得的快乐和满足。为了弥补这两种方法各自的缺点, 本文主张从整体角度理解和强调与生活质量相关的问题。因此, 本文以中国和尼日利亚为例, 确定、描述并分析发展中国家生活质量的内容和意义。为便于进行比较分析, 本文将列出中、尼两国的减贫政策。在此过程中, 会出现两个研究方面的问题: (1) 生活质量包括哪些重要因素? (2) 政府可能制定和使用哪些政策来达到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 此外, 这些政策与千年发展目标有什么关系?

要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必须在一开始先理解和定义生活水平。它可以通过使用一些选定的指标来说明, 即“与政策相关且不受时间和(或)空间影响的可衡量变量”^④。关于发展问题研究, 特别是与生活质量有关的研究中, 可以采用一些指标, 以建立一个可衡量的分析框架。

生活质量 和千年发展目标的含义

虽然学界对生活质量的定义还未达成一致,^(四) 但关键是, 承认强调生活质量是为了将全体国民从物质匮乏和贫穷的生活状态提升到一种较舒适的状态。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生活质量的提升意味着获得安全饮用水、受到良好教育、得到更高收入、良好医疗保障、就业机会, 以及其他方面的改善。另一方面, 世界卫生组织将生活水平定义为受一系列因素影响而产生的生活条件, 例如健康、快乐、教育、社会性和知识性所

得、行动的自由、公正, 以及摆脱压迫的自由等。^{1/4} 因此, 按照这一定义, 生活质量可以被视为对个体和某一群体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福利的一种综合衡量。^{1/2}

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生活质量的特征, 学界在此概念上的分歧还将继续下去。^{1/4} 最终, 含义上的不清晰可能成为生活质量这一概念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世界大部分地区, 构成农村生活质量的基本要素是类似的。但有些要素是有地方文化和当地特色的, 例如衣服种类、或房屋种类、或可获得的食物和人居环境等。

1996~2006年被称为“国际消除贫困的十年”^⑤, 也即提高世界生活质量的十年。也许是为了表明已有的努力还不够, 联合国在新千年前夕发表了一份《道德宣言》(moral declaration), 且保证在2015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近年来, 贫困问题成为国际议题的中心。消除贫困是约翰内斯堡峰会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六) 在提高世界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方面, 千年发展目标是一个起点。

千年发展目标是世界各国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它代表着一种真正的世界发展战略。早些时候, 研究人员通过大量研究意识到, 贫困兼有

¹ See Liu Li “Quality of life as a social representation in China: a qualitative study”,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6 Vol. 75, pp. 217–240.

^④ F. A. Steinhilber, A. Hanedinger, N. Holman and Y. Rydin “Institutions and indicators – the discourse about indicators in the context of sustainability”, *Journal of Housing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2004 Vol. 19, pp. 7–24.

^(四) See M. Bullinger “The Challenges of Cross-Cultural Quality of Life Assess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Researching Well-be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ans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Dethlefsenhorst, Bremen, Germany, July 2–4, 2004.

^{1/4} Se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orld Health Report 1999*,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99.

^{1/2} See R. Nagpal and H. Selj “Subjective well-being”, SEARO regional health paper No. 7, New Delhi: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85.

^{1/4} See D. E. Bloom, P. H. Craig and P. N. Malaney, *The Quality of Life in Rural A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⑤ F. Mayor “Statement of international poverty eradication day”, in Yogesh Atal and E. Se Oyen ed., *Poverty and Participatory in Civil Society*, UNESCO and ESC/CROP, 1995.

^(六) Se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持久性和多重性的特点，消除贫困也因此成为千年发展的首要目标。贫困是一种复杂的¹、具有多重性^④、欺骗性和迷惑性的现象^④。贫困还是一个与研究地区有关的模糊而具有相对性的概念^¼。

贫困以多种方式存在，不同地区的贫困程度不一。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来说也是如此。贫困在所有的社会都是一种阶级现象，既然社会是分阶层而存在的，某些群体就会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对这些群体来说，他们的基本需求常常得不到满足；至少在一年中的某些时候，他们的食物消费可能低于最低生存需要；他们的收入低到难以满足基本的食物和非食物需求；他们常常缺少医疗、教育、必要的房屋和衣服、安全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等。从全球范围看，以上这些方面从实物、经济、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等角度诠释了贫困——这一千年发展目标中首要目标的多重性特征，这些特征既相互区别，又彼此联系。正因为如此，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中包含了 8 个目标，而其中又包含了 18 个子目标和 48 个可以衡量的指标（见表 1）。

表 1 千年发展目标

目标序号	目 标 内 容
1	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
2	普及初等教育
3	促进性别平等，赋权于妇女
4	降低儿童死亡率
5	改善孕产妇健康
6	遏制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
7	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
8	为发展而建立全球伙伴关系

衡量贫困一个指标的变化会导致其他指标的变化，这表明了贫困具有联动和相互强化的特征。例如，良好的健康状况可以使一个人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一方面，在其他指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某一指标的变化也不能持久。只有多方面的积极变化，才能打破贫困恶性循环，最终提高特定社会的生活质量。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尼日利亚，生活质量可以被视为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居民生活受到文化的引导，霍夫斯塔德（H ofsted e）^½指出，应该在进一步分析中考虑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¾、不确

定性、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和性别等因素。因此，如何确定一系列可衡量的新指标便成为令人感到困扰、且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尼日利亚和中国
的 减 贫 政 策

通过观察尼日利亚和中国的现状，我们可以发现两国的共同点或相似之处。从面积和人口规模看，尼日利亚均是中国的 1/10 从资源禀赋看，两国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另外，中、尼两国在历史传承、历史发展、文化的多元性等方面有诸多的相似和不同之处。中、尼两国也都有大量且延续数千年的宗教组织。在当前的发展问题研究中，两国可以分别作为亚洲和非洲的样例。中国已经成功地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之一，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且保持了社会稳定。而尼日利亚虽然也采取了改善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的政策，但仍处于经济发展的边缘。

尼日利亚在 1960 年独立之初，外界公认它是一个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国民勤劳而充满活力的国家。但 1999 年尼日利亚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仅为 0.416 是世界上最贫穷的 25 个国家之一。相比之下，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则从 1975 年的 0.522 稳定增至 2000 年的 0.726

¹ See Bevan, Philippa and Sandra Fullerto Joireman, “The peril of measuring poverty: identifying the poor in rural Ethiopia”,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1997, Vol 25, pp.315 - 344 C. Sullivan, “Calculating a water poverty index”, *World Development* 2002, Vol 30.

^④ See Robert Chambers, “The origins and practice of PRA”, *World Development* 1994, Vol 22 pp.953- 969.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Washington D. C.: Oxford Press for the World Bank 1990.

^④ See I.E.T.El Naayal “Poverty and the environment Rio + 10 review report”, <http://www.worldsummi2002.org/texts/sudanilris-p.pdf> 2002.

^¼ See Bevan, Philippa and Sandra Fullerto Joireman op. cit, pp.315- 344.

^½ See G.Hostede op. cit, 1980.

^¾ 根据荷兰学者霍夫斯塔德的解释，“权力距离”指人们对不同级别者所拥有权力差异的认可程度，它是文化的表现之一。“权力距离”在不同的社会和民族中，有高低之分。

表 2 可比性指标 (2001~ 2005 年)

指 标	中 国	尼日利亚
面积 (平方公里)	9 561 000	924 000
人口 (亿)	13	1. 3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 (2005 年估计数)	9. 5	6. 2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美元)	6 800	1 400
2001~ 2002 年通货膨胀率 (%)	- 0. 8	12. 9
人口增长率 (%)	0. 59	2. 38
贫困人口比例 (%)	10	60
预期人均寿命 (岁)	72. 5	54

资料来源: 数字世界 (World in Figures)、《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 2004 年版, 及英国国际发展部 (DFID) 的国别资料 (country profile) 等。

虽然连续的几届尼日利亚政府都实施了减贫项目, 但是现实情况和表 2 中的数字仍然令人震惊。事实上, 政策失误已被诸多事实所确认。例如, 20 世纪 70 年代尼日利亚政府引入了“国家粮食增产项目”(National Accelerated Food Production Program)。继而, 该国政府在 1976 年推出了“国家粮食自给行动”(Operation Feed the Nation)。1979 年, 政府又引入了“绿色革命项目”(Green Revolution Program)(参见表 3)。这些政策体现了一种实际的政策动向, 即在尼日利亚, 贫困是农村地区的普遍现象(像在世界其他地区一样), 尽管并非全都如此。因此, 在尼日利亚, 为了克服贫困所引发的种种危机、提高尼日利亚国民的生活质量, 应该在政策中包括农业、农村发展、就业问题, 甚至包括生态环境方面的内容。其他与减贫和发展相关的项目还包括了 1984 年的“回归农田项目”(Back to Land Program)。1986 年建立的“食品、道路和农村基础建设理事会”(Directorate for Food, Roads and Rural Infrastructure, DFRRI)也是为了相似的目的。当时尼日利亚实施的配套项目包括“更好生活项目”(Better Life Program), 以及后来的“家庭支持项目”(Family Support Programs)和“家庭经济改进项目”(Family Economic Advancement Programs)。后两个改善妇女权益的项目都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实施。虽然这些项目看上去适合当时的时代背景, 但是项目动议和实施的独裁性特征 (dictatorial tendencies) 决定了其失败的后果。在法律监督尚不健全的情况下, 政府在实施项目中常出现随

意性, 因而使这些项目往往无法达到预期目标。

表 3 与减贫相关的政策回顾

年份	具 体 政 策	政 府	主要目标部门
1972	国家粮食增产项目	雅库布·戈翁时期	农业和农村发展
1976	国家粮食自给行动 (OFN)	奥卢塞贡·奥巴桑乔时期	农业
1979	绿色革命项目	哈吉·谢胡·沙加里时期	农业
1984	回归农田项目	穆罕默德·布哈里时期	农业、农村
1986	食品、道路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理事会 (DFRRI)	易卜拉欣·巴班吉达时期	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发展
1987	更好生活项目 (BLP)	易卜拉欣·巴班吉达时期	农村发展、妇女权益
1994	家庭支持项目 (FSP)	萨尼·阿巴查时期	妇女权益、儿童发展
1997	家庭经济改进项目	萨尼·阿巴查时期	妇女权益、儿童发展
2001	国家消除贫困项目 (NAPEP)	奥卢塞贡·奥巴桑乔时期	所有部门

虽然这些政策的出台是基于本国实际情况, 但是在政策实施上缺乏战略性, 原因在于它们大多采用了自上而下的实施方式 (然而, 一些自上而下的政策实施方式有取得成功的案例, 特别是在既有政治意愿、又在进行经济和政策改革的中国)。尼日利亚在这方面失败的原因可以归咎于国家政权的不稳定和资金被转移。另外, 尼日利亚仅仅在概念上自上而下的实施方式, 掩盖不了政治意愿的缺失和政策实施中广泛参与机制的缺失。中国减贫的成功经验还归因于本国草根阶层 (grass roots level) 的参与。¹

上述提到的许多项目都在尼日利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遭受了失败。虽然这些项目是由政府发起, 但是其中有些项目并没有完全被用于减贫。总体来看, 这些项目缺少监测和评估成功与否的合适框架, 从而在政治不稳定或政府更迭时而突然中断。基于对过去项目的错误和缺陷的了解, 尼日利亚政府在 2001 年启动了国家减贫项目 (N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

¹ See Jinyun Pan, Zhixiong Du and Xinhui Wang, “A Study of the Strategy and Measure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China,” Bangkok: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Regional Office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region/asro/bangkok/paper/pov_chn.htm, Last accessed on May 22, 2003.

NAPEP)。该项目的目标是到 2010年消除贫困,以提前 5 年实现联合国制定的目标。为达此目标,该项目确定了 3 个实施阶段: (1) 总体上重现尼日利亚穷困人们的希望; (2) 帮助贫困人口取得经济独立, 恢复普通百姓的信心; (3) 实施创造财富的政策。¹

同样, 中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也启动了减贫项目。总体来看, 它也分为 3 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 (1978~ 1985 年), 主要是改革农业经济体制, 以减少贫困。通过此阶段的努力, 中国农业劳动力得到了解放, 土地的产出有所增长。第二阶段 (1986~ 1993 年), 农业改革的成功推动了大规模的、具有发展导向的减贫运动。这段时间明确了不均衡发展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 因此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具有明确发展导向的减贫运动。在前两个阶段取得成功的基础上, 政府意识到, 恶劣的自然条件、薄弱的基础设施和落后的社会发展是消除贫困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因此, 第三阶段 (1994~ 2000 年), 中国的减贫政策主要围绕上述问题展开。^④

相关生活质量指标的应用

本文对生活质量和减贫问题的研究具有跨文化的应用性。然而, 生活质量的结构能在多大程度上从一种文化环境转换到另一种文化环境还不清晰。近年来, 虽然对生活质量的研究开始受到学者重视, 但在国际生活质量研究中, 对概念划分、方法论和比较结果的实际应用的要求越来越高。^④ 目前对尼日利亚生活质量的研究资料比较缺乏, 特别是还没有对中、尼两国减贫问题的深入比较研究。因此, 对各种减贫和提高生活质量相关政策的了解, 有利于弥补人们这方面知识的缺乏。作为一个初步的比较分析框架, 确定一些必要的指标是进一步分析的基础, 本文表 2 列出了经常用于国际发展比较的常用指标。

在生活质量研究的具体操作上, “国家”这个词有不同的含义: 从政治层面看, 它是指一个民族; 从地理层面看, 它代表国家; 从人类学层面看, 它是指文化; 从社会学角度看, 它是指社会; 从心理学层面看, 它是指其成员身份。^{1/4} 所有这些含义都在这一概念中得到体现, 这使它成

为评价生活质量时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之一。虽然有表 2 中所列的指标, 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中研究贫困, 有利于我们加深对个体和社会福利的理解。事实上, 正是定义的确定的和方法论上的复杂性, 使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减贫政策和生活质量研究工具的应用, 以及跨文化的比较工作成为研究者所面临的挑战。这种复杂性表明选取的一些指标是恰当的、合理的。

人类学家侧重于研究跨文化和民族的生活质量指标, 而本文主要关注的是衡量生活质量的客观指标。这些指标与减贫政策有关。生活质量的主观指标最近才在一些有关居民福利的社会学调查中出现。^{1/2} 布瑞斯林 (Brislin) 等学者^{1/4} 早在 1973 年就指出在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转换时, 语义的等同 (例如可比较的含义)、内容的等同 (例如跨文化问题的相关性)、技术的等同 (例如问题的种类) 及标准的等同性 (在各种文化中调查问卷的作用) 是很重要的。

人类的健壮也表现为更好的健康状况和更长的寿命。因此, 我们可以由一国国民的健康状况和他们所生活的环境状况推断出一个国家的生活质量。这些也能够帮助我们划分特定社会的贫困水平。但是, 人类的活力不仅仅体现在人的生物机能上。与动物和植物不同, 人类可以对自身及所处的环境进行反思。对舒适的生活环境的要求

¹ See N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me “Eradicating Poverty”, http://www.nigeriafirst.org/printer_263.shtm Last accessed on June 20, 2003.

^④ See Bingling Li “The progres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experience, problem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Asia-Pacific”,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Advisory Panel on ESCAP/UNDP initiative to support the achievement of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Region, 2002.

^④ See R. See, R. Berzon, D. Hays and S. A. Shumaker, “International use, applic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instruments”,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1993, Vol. 2, No. 6, pp. 367-368.

^{1/4} See M. Bullinger “The Challenges of Cross-Cultural Quality of Life Assess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Researching Well-be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ans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Delnhoorst, Bremen, Germany, July 2-4, 2004.

^{1/2} See I. Campbell ed., *The Quality of American Life*, New York: Russell-Sage, 1981.

^{1/4} See R. W. Brislin, W. J. Lonner and R. M. Thorndike *Cross-cultural research methods*, New York: John Wiley, 1973.

也体现在人类对生活的评价中。因此我们可以从国民的幸福和快乐程度推断一个国家的生活质量。基于这样的理解，国家间的比较是有效的。根据表 4 列出的比较框架，我们可以对不同地区给出可衡量的指标。

表 4 描述国家状况的指标

指标	中国	尼日利亚
生产力水平低	×	✓
技术水平低	×	✓
社会收入差距大	✓	✓
地区间发展水平差距大	✓	✓
自然资源和社会基础设施薄弱	×	✓
公共机构职能较差	×	✓
非正式部门强大	✓	✓
网络功能优于阶层	✓	✓
不属于西方文化领域*	✓	✓

说明：“✓”表示肯定；“×”表示否定；* 这里指该国的传统文化（original culture）。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尼日利亚统计局（FOS）和《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相关信息归纳和整理。

结 论

为了实现减贫和提高生活质量的目标，当今我们所面临的情况越来越复杂。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没有一个体系或部门可以被单列为最重要的体系或部门。次级系统还包含了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事实上，以尼日利亚为例，农村地区贫困的主要后果是食物短缺、自然资源衰竭和环境遭到破坏，以及农村人口的外流。¹ 贫困带来的其他后果还包括社会的不稳定、工业部门的瓦解和缺乏竞争力、腐败及恶性通货膨胀。

在当今时代，全球体系的运动能够影响所有的次级体系。次级体系中存在的利益均沾效应^④对于当地人民贫困状况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例如中国从全球化中获得了减贫和提高生活质量的益处，而尼日利亚并非如此。全球化带给尼日利亚的是政治不稳定、基础设施陈旧和社会不稳定等方面的阵痛。另一方面，中国正在全球化时代快速发展。为了最大程度地从全球化中受益，中国政府正在加快改革的步伐，在增加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在大刀阔斧地改革国内银行业和贸易政策。^(四) 因此，对于尼日利亚和中国而言，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利用动态体

系以获得最大收益，并消减其负面影响。

鉴于尼日利亚农村（或城市）人口分布的特点（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也是如此），成功消除贫困的战略重点必须向小规模农业生产（和非正规经济部门）倾斜，就像已经在中国实施的那样。为使政策成功地取得实效，改善尼日利亚政府的治理能力和经济管理能力和都至关重要。良好的管理是提高当地人民生活质量的保证。

最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减除贫困方面逐步取得了显著成就。通过上述中国 3 个阶段的减贫政策，发展导向的项目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这是值得借鉴和效仿的。为了取得成功，适当的做法应该是让农民参与减贫项目，并最终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总之，本文对生活质量的的研究可以概括为“经济逻辑”和“存在主义逻辑”两个方面。一方面，在许多像尼日利亚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生活质量是社会面貌的反映，它既是个人价值，也是社会价值的体现。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把经济发展作为衡量生活质量的主要指标的同时，环境和社会方面的指标也应成为测度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后一个方面也正是前文提到的千年发展目标的首要原则。

张春宇* 陆 航** 编译
(责任编辑：安春英 责任校对：成 红)

* 本文编译者张春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助理研究员。

** 本文编译者陆航系中国工商银行总行现金管理部职员。

¹ See D. Hounkonnou, “New partnership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in Africa learning from local dynamic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on Poverty Alleviation, Costa Rica, September 14– 16, 1999.

^④ 利益均沾效应（“Trickle-down effect”，又译为涓滴效应、渗漏效应、滴漏效应），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给与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的优待，而是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

^(四) See Yong Deng and T. G. Moore, “China Views Globalization Toward a New Great-Power Politic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04, Vol. 27, No. 3, pp. 117– 136.